

从安源党校创办看党校工作历史的源和流

□ 张卫波

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①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党的第一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的要求，“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安源党校创办于1924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党校之一。安源党校的创办既是列宁及共产国际关于办党校思想影响的结果，又同党中央的要求，以及安源地区工人运动和党组织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回顾安源党校的创办，更有利于厘清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历史的源和流。

列宁关于办党校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创办党校，以及安源党校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最早提出办党校思想。早在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八大上就提出了办党校的主张。在列宁的倡导和推动下，大会通过决议，责成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建立“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制定“地方党校的统一的^②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派有关的讲课人“帮助地方党校”。1920年3月底召开的俄共（布）九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决议，要求“应当特别注意进一步发展各种党校（高级党校、初级党校、指导员党校）”。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要求“扩大党校网”，规定“必须大力增加党校”。根据这些决议和要求，到1922年，苏俄全国各地共建立了240多所各级各类党校，在校学员达2.2万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列宁重视建设党校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党校的创办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方面缘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另一方面还在于赴苏俄留学人员的积极推动。例如，安源党校的创办者刘少奇、汪泽楷、肖劲光等人，以及北京党校的创办者罗亦农、赵世炎等人都是从苏俄回国之后，开始筹办党校的。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为早期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推动了安源党校的创办。共产国际是在列宁倡导下建立的，又称第三国际。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



安源党校旧址

国支部”。同年12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各国共产党的教育工作》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等类学校”。1923年6月，在党的三大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了“我党领导人的教育工作”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通过《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首次提出建党校问题，认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安源党校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创办的。

安源党校的创办，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党中央要求加强党内教育的结果。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党内教育问题的重要性。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也急剧增长。到1924年底，全国党员数量已经由建党时期的50多人发展到将近1000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党校以提高党员素养、培养党的干部就显得极为迫切。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安源地区的党员和党组织发展尤其快。据统计，1922年2月，安源党组织刚成立时只有党员6人，到1923年8月，安源党员发展到40人，到1924年5月，安源党员人数增加到60人，至同年年底，安源地委所辖党支部增至15个，党员人数猛增到198人，占全国党员人数的五分之一。同一时期，安源地区的团员数量也增加很快。这使得基层党团组

织的干部大量短缺。正如贺昌在《致青年团湘区和中央信》中所说：“安地太缺乏人做事，实有培养人材之必要”，“安地团务日形发展，至少须有两专人负责，才能维持。现在委员会诸人，均在工部或教股兼事，忙繁异常，对团务常有照顾不到之势。如此下去，瞻望前途，危险丛生”。可以看出，建立党校以培养干部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件十分迫切的事情，可谓势在必行。而在安源党校创办之前，李立三于1922年1月已经在安源建立了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在建党初期，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同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湖南自修大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源头，也为安源党校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安源党校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点和影响。安源处于江西、湖南的交界，交通便利，距离长沙尤近。这使得安源地区不仅在经济上同湖南联系紧密，而且还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汪泽楷、肖劲光等人既是安源党校的创办者和教师，又都是湖南人。他们深受湖湘文化濡染，他们身上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及对教育的重视，也直接影响了安源，推动了安源党校的创办。

安源党校创办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点，反映了党校工作历史的“源”。而安源党校对党校发展及党校班次设

置、课程设置的影响，则体现了党校工作历史的“流”。

首先，安源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的开端和源头。在安源党校创办之后，党中央随着各个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陆续通过了一系列创办和发展党校的决定：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强调“有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之必要；同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之进行计划》中又规定，“在某种可能范围内，本部须督促各地方设立党校或党星期学校”；10月，中共中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开办“各地委之下普通的党校”和“区委之下的高级党校”；1926年2月，党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这为党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和依据。

其次，安源党校的班次设置，是其后党校系统班次设置的先导。安源党校开办时共60人，按照程度高低分为两个班进行授课。这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因材施教教学方法，同时，也是后来直至今天党校分班教学、分类授课的源头和先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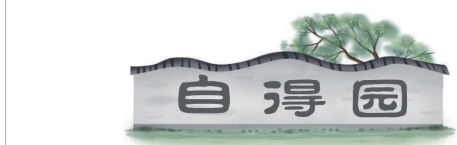
最后，安源党校的课程设置，初步蕴含着党校正规化办学后课程设置的一些重要内容。安源党校创办后，所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浅说》《少年运动史》等，尽管在当时还比较简单，但是已经蕴含了理论教育、党性教育等内容，这也为之后党校课程设置提供了参照。

总之，把安源党校的创办放在国际共运史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大背景下，放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大革命时期的进程中，放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百余年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安源党校作为最早党校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加清晰。今天回顾和研究安源党校的创办历史，探寻党校工作历史的源和流，有利于推动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实现更好的发展，从而为党的事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红色记忆

南 门 湾 随 想

□ 徐 新



移山填海、让孤岛变半岛，这些齐心协力、战天斗地的奋斗故事，吸引着我踏上了前去福建东山县的旅程。

南门湾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是东山岛上一处月牙形的自然内湾。我们到了这里，看到海面宽阔、沙滩平缓、绿树成荫，一派南国海滨风光。沿着海堤一路走过，感受着海风轻拂面颊的温柔，前望，是蔚蓝的大海；背后是鳞次栉比沿山坡而筑的民居，俨然是一幅天然美丽的和谐画卷。

早晨的南门湾是一个看日出的好地方。远远望去，最初只见地平线上轻雾缭绕，粉红色的海洋与浅蓝色的天空交界处水乳交融，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朦胧美。鲜红的旭日从云雾中徐徐升起，光芒逐渐绽放。忽然，这个火红的球猛地跳出了水面，射出万丈光芒，海水把它折射成千万条耀眼的光带，这些光带穿过薄雾之后，化成一条绚丽的彩虹。

晌午，骄阳灿烂，金沙闪烁，海堤上晾晒的海鲜干品散发着诱人的鱼香。宽阔而平坦的海滩沙质细软，赤脚走在上面柔柔软软的，非常舒适。海水清澈透明，在阳光照射下泛着耀

眼的光芒。人们在这里游泳、玩沙子、晒太阳，尽情享受大海的气息。

当夕阳西下，金色霞光将天空染成了淡紫色，宁静而柔和。南门湾的海面一片金黄，淡紫色的天空倒映在海面上，仿佛注入了一池温暖的光。渔舟唱晚，波光粼粼，潮水也变得温婉起来，人们在这个时候悠闲垂钓，惬意无比。渔人码头的小舟轻轻摇曳，似乎在诉说着渔村的岁月静好。渐渐地，天色暗下来，万家灯火次第亮起。

夜幕降临，热闹的夜市也拉开了帷幕。在堤岸两侧，摊主们开始摆摊。五光十色的招牌灯纷纷点亮，叫卖声此起彼伏。烧烤的香气、海鲜的美味，还有各式东山特色小吃的诱人气息，交织成一首美食交响曲。堤岸上，人潮涌动，人们或闲逛，或品尝美食，或欣赏夜景，或者海听潮……这就是最自然的风情韵味吧。

南门湾是一处不可多得의 诗意栖息地，蔚蓝的大海与古朴的渔村相连，彩色的房子沿着海岸线错落有致地排列，仿佛童话世界一般。宛如新月的海湾、蓝如翡翠的大海、金黄细腻的沙滩、静谧自然的老街，让人流连忘返。

南门湾，如此美妙的南门湾。看到眼前无限美好的景致，真难以想象60多年前东山岛的样子。那时的东山岛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每每遭遇台风，居民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当地朋友介绍说，东山岛地处福建东南海域，其西北部的八尺门，与云霄县隔海相望，最近距离只不过五六百米，但自然条件恶劣，四面环海，水深浪高，东山人进出海岛都依靠摆渡，遇到风高浪急的情况，舟覆人亡的惨剧时有发生。这道窄窄的海峡，给东山的经济发展、海防建设和群众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千百年来，人们面对滚滚怒涛，无不望而生畏。当时的东山，人力、财力都非常有限，修一条海堤困难重重，但“把海岛变半岛”一直是东山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1959年12月，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决定启动八尺门海堤工程，向自古被岛上人们称为“天堑”的大海开战。他兼任建堤领导小组组长，经常吃住在简陋的工棚，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筑堤方案，同群众一起挑砂石、扛石板、推独轮车。最终，谷文昌和建设者们克服了海峡狭窄、海底地质复杂、部分礁滩外露、水深流急、

海潮涨落等重重困难，历经两年时间建设起这座风雨安澜的堤坝。这座海堤，底宽110米、堤面宽13米，大堤高出水面5米，全长569米，犹如“卧海巨龙”，让天堑成了通途，孤岛终成半岛，圆了东山人千年的梦想。1962年9月，12级强台风正面袭击东山，城关镇（今铜陵镇）南门湾首当其冲，海水冲上海岸，灌进居民区，人们的家园瞬间变成一片汪洋。谷文昌见状，当机立断作出修建南门海堤的决定。城关镇群众得知情况后，争先恐后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一时间，工地上人头攒动、尘土飞扬，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南门防潮堤在第二年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全部完工。

我眺望着横卧在铜山古城下的南门海堤，它以完美的圆弧形向两边延伸，顽强地抵御着巨浪的侵袭，保护堤内的东山百姓，仿佛在奏响奋斗者幸福与荣光的乐章。“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的习俗，生动诠释了东山人对谷文昌书记深深的感激和礼敬。而谷文昌面对困境不屈不挠、勇于担当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东山人，继续书写这片土地的辉煌与传奇。



走进江苏省苏州中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所具有近千年历史的学校创办者范仲淹的花岗岩雕像。1035年，范仲淹在这里捐地兴办官学，创办苏州府学，“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影响深远，被宋仁宗钦定为天下郡学之规制。

造福桑梓 兴办府学

在历史上，今苏州中学所处的位置曾被称为“南园”，位居苏州古城区正南部，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园林遗址。北宋文学家王禹偁曾经写道：“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1034年，范仲淹调任祖籍地苏州，为建居宅找到了这里。有人说，这是块宝地，住这里可以世世代代高官显贵。范仲淹听后却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毫不犹豫地將房地献出，奏请朝廷批准设立苏州文庙府学，实行庙学合一的官学规制，即文庙府学合一，又称“左庙右学”，以期培养更多人才。更值得称道的是，范仲淹破除“生徒必出簪纓”的旧制，特设“寒俊斋”收纳贫寒子弟。

学校建成后，范仲淹写信邀请当时知名学者孙复前来讲学：“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孙复因故未能成行，范仲淹转而邀请另一知名学者胡瑗前来主持苏州府学。胡瑗作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被后世尊称为“安定先生”，范纯佑、滕甫等皆入胡瑗门下，其时“门人以千数”。当时苏州府学规模之盛大，令人瞩目。尤其是将文庙与府学相结合，在当时影响极大，各地州、县纷纷效仿。据说江南文风的昌盛即得益于此，并有了“苏学天下第一”的说法。

这里在1035—1113年为苏州州学，1113—1276年改称平江路学，1276—1367年称为平江路学，1367—1904年才叫苏州府学。1613年，清代理学家、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里创设了紫阳书院。紫阳书院时期，在当时读书人都想走“学而优则仕”这个独木桥时，以沈德潜、钱大昕等为代表的饱学之士主张不以科考为务，不为专写八股文而学八股文，而是要培养一流经学人才的先进教育观念，为江南文脉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贡献。

宋、元、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登科者甚众，其中状元就有数十位，多数人都为官方一方，做出了不少政绩，范仲淹兴办府学的余泽可谓大矣。

明体达用 分斋教学

范仲淹认为，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紧密相连的。他提出学校教育学生要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教授算学、水利、兵事等专科知识，培养有才、有道、有功的英才。这类人才不但通“六经”之旨，还要懂得历史兴衰之道，掌握治国方略，经世济民，成为“以教化为中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的济世良才。

胡瑗受范仲淹的激励、延聘和推荐，将其复兴儒学的精神和教育主张付诸治学和讲学之中，将其发扬光大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胡瑗主张“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首次提出并创立了分斋教学的制度，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所谓“分斋教学”，特立“经义”与“治事”二斋，“经义”重在阐明为人之本和立德之本，“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致用的特点。这种教学改革，既能让学生领悟圣人经典义理，又能学到实际应用的本领，可胜任行政、军事、水利等专门性事务。

苏州府学以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为传承江南文脉和培养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代苏州

范仲淹与苏州府学

□ 李静会 余大庆



府学生员王鏊曾叹：“自范文正捐宅以来，吾吴中进士及第者六百有奇，冠盖满京华，岂非文脉所钟乎？”

以学济世 影响深远

范仲淹的教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宋文化和实用科学的发展。

1044年，在范仲淹的倡导之下，宋仁宗下诏让全国各地州郡都建立学校，自此官办学校遍地开花，州有州学、县有县学，教育之风大盛。元代诗人郑元祐在《吴县学新门铭序》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则亦由于中吴。盖范文正公以宅建学，延安定胡先生为之师，文教之事自此兴焉。”范仲淹教育首创之功，自此影响了近千年。

从苏州府学“毕业”的良臣能吏，主要有长于经义之学的孙觉、朱临、倪天隐等；长于政事的范纯仁、钱公辅等；长于文艺的钱藻、滕元发等；长于军事的苗授、卢秉等；还有长于水利的刘翥等。一时间人才济济，开创了北宋教育的繁荣局面。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这样的情形，与当时府学培养出大量人才密不可分。

到明清之时，有识之士对实用科学也非常重视。比如同为苏州人的顾炎武就建议“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这也是承范仲淹教育观念之余绪。教育家颜元则说：“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要求读书人不但熟悉儒家经典，还要学习天文、地理、兵农、工程制造等专业知识。从这两位大儒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范仲淹首倡的培养经邦济世实用人才的教育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